

專號引言

經學源發於中國並具有源遠流傳之發展歷史，繼而流傳至東亞各國，經由吸收東亞各國之自國文明與文化，遂於該國民族文化傳統中進行受容、創新，進而產生因時、因地之變貌。而此種經由受容進而產生變容之儒家經典之解經方法、過程與內容，無庸置疑地，值得吾人深入探討研究。而欲考察此種儒家經典於東亞地區的跨域性、歷時性傳釋議題，不僅須要抱持開放性研究視角，也應著眼於經學研究之普遍性，同時更應關注中國以外東亞各國本地經學詮解、研究、發展之獨特性。在此種問題意識下，本次專題策劃人乃結合香港、日本、韓國等地，有志一同關心此一學術研究議題的學界同道，擬逐年於東亞各地舉辦「儒家經典的跨域傳釋國際學術研討會」，試圖結合東亞各國之經學研究者，一起共同研討儒家經典在日韓的傳釋實相。

「儒家經典之跨域傳釋工作坊」研究團隊，主要合作成員有：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盧鳴東教授、嶺南大學中文系許子濱教授；韓國成均館大學東亞細亞學術院李聆昊教授；日本東京大學中國思想文化學研究室陳捷教授、早稻田大學創造理工學部社會文化領域永富青地教授、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研究員古勝隆一教授。而二〇一六年八月二十三、二十四日，「第一屆儒家經典之跨域傳釋國際學術研討會——經學的源流與創新：由歷史性與地域性視野考察」已於韓國成均館大學東亞細亞學術院順利舉辦，會中台、港、日、韓等地近三十位經學、儒學研究者齊聚一堂，分別就儒家經典於江戶日本、朝鮮韓國以及近代東亞的傳釋問題，進行深入研討。發表論文中，或就某部專經經解之「日式」、「韓式」注解問題，指出日韓儒者解經之特點；或就某一經書注解發展史上之學術公案，例如古文尚書問題，為何在日韓學界引發完全不同的「偽古文尚書」觀點提出看法；或就江戶後期經解的博物學發展傾向，以看出《詩經》詮解在江戶後期所產生的變貌；或就「聖蹟圖」在日韓的傳衍，以窺知儒家聖人觀在日韓兩國的受容與變遷；或就殖民地韓國的儒學研究，以考察近代日本於殖民地如何利用儒家經典以及儒學教育，以宣傳其殖民統治教育政策。

本次專題「儒家經典於朝鮮的跨域傳釋：歷史性與地域性的考察視野」所收四篇論文，在投稿前業已於「第一屆儒家經典之跨域傳釋國際學術研討會」中進行口頭發表，會後進一步修訂後乃投稿至本專題。此四篇論文主要在探討《易經》、《詩經》、《左傳》以及《論語》於朝鮮後期，究竟是在何種「朝鮮」當代的時代、社會、政治、學術脈絡下，如何被鮮儒加以重新詮解？其中，有考究《易經》是如何被鮮儒重新詮解，以與帝王學結合之論文？也有就《詩經講義》而來考察鮮儒是如何透過「講經」、「議經」，以參與朝鮮國王之經義一統作業的論文？又有闡明朝鮮君臣如何藉由考證杜預《春秋經傳集解》，試圖透過「尊經」與「釋經」，以引伸「大一統」思想與「尊君大義」的論文。除此之外，還有論文關注到朝鮮後期嶺南退溪學派後學，究竟如何藉由重解《論語》，而試圖掙脫退溪與朱子經解的權威束縛，以提出己意，同時卻也使得嶺南退溪學注經發展產生轉向。

如上所述，本次專題所收四篇論文，皆是研究朝鮮時代後期經注之專文。馮曉庭〈《周易》帝王學——李玄錫《易義窺斑》初探〉一文，關注到了奉朝鮮國王之命學《易》，以待日後進行「經筵進講」的李玄錫，從今日所遺留下的朝鮮經筵史料看來，並未載錄其有進講《周易》。但是，李玄錫確實撰作了《易義窺斑》一書。馮曉庭透過比對《朝鮮王朝實錄》、《承政院日記》與李玄錫之「自述」，首先證成《易義窺斑》之成書，最晚應成於朝鮮肅宗十七年（1691），而非韓國學界先行研究所指出的一六八〇年。進而將該書置於肅宗朝的《周易》進講經學文獻中，就其注經形制與內容，確實與《周易注疏》、《易程傳》、《易本義》、《周易傳義大全》進行比對考察後，馮曉庭定位《易義窺斑》乃李玄錫「自設」之經筵進講內容。而該書表面看似依據程朱《易》學，實則淵源於《周易傳義大全》。

李玄錫透過《大全》以理解宋元儒士之《易》學面貌的這一解經法，不僅凸顯出十七世紀末期朝鮮儒者的經學學習依據，不在直就程朱經解；而是與明儒同樣地藉由《大全》諸書，讀經習藝、干求俸祿取資。且其明經致用，試圖為帝王治世而作經解的治經意圖，亦與中國歷來之治經者無

異。故李玄錫《周易窺斑》，非專為述朱，其不言象術，專門於義理，正是試圖以自我通達之無窮義理，以為帝王治世之用。故其所詮解之《易》義，屬於「行權」之於「經常」，是生於朝鮮本土的特殊經義，而非《易》義之普遍通則義理。所以讀者可於《周易窺斑》中看到李玄錫特舉黨錮牛李蜀洛，以詮解〈訟〉「九五」，並直言唯有中正人君方能排除消弭朋黨之爭，足見李玄錫解《易》之關心所在。至於李玄錫解《易》所以能「立言取象」，只要「不害於道理」，則敢於「自為一說」，不顧忌「有可以歧異者」，其此種詮解《周易》之基本立場，主要乃承襲自許穆。

張曉生〈朝鮮正祖時期儒臣對於《左傳》杜註的辯正——成海應《杜註考異》之文獻與義理初探〉一文，研究對象為成海應《杜註考異》一書。該書成書背景導源於朝鮮正祖晚期詔修《春秋左氏傳》，該書修訂完成後，正祖又進而命成海應將書中與杜預《春秋經傳集解》有異之經解，逐一羅列說明，遂成《杜註考異》。張曉生之文，聚焦於《杜註考異》之編輯體例，以及該書對《左傳》經文義理之闡釋、對《左傳》及杜預《春秋經傳集解》的批改，乃至為了考證杜註與《左傳》之間，其經解是否合於經書意旨，成海應又是如何揀擇取捨經學文獻材料等問題，逐一進行考察探究。蓋成海應《杜註考異》一書，堪稱是朝鮮後期《春秋》學研究的綜合體現，藉由張曉生此文，讀者既可綜觀朝鮮後期《春秋》學研究之面貌，更可知當時朝鮮君臣詮解《春秋》經之準據，就在經義是否符合「尊經／尊君」大義。而此一解經準則，既是當初朝鮮正祖重新詔修《春秋左氏傳》的用意，同時也是朝鮮後期《春秋》學之一大特點。

張曉生此文藉由對成海應《杜註考異》之研究，更進一步釐清了朝鮮後期正祖朝所詔修之《春秋左氏傳》，其所以在文獻上多參用《春秋傳說彙纂》，原因應在其乃奠基於朱子《春秋》學觀點所建立之詮說文獻。而成海應此種維護朱子學術立場的基本解經態度，不僅見於其《左傳》詮解，由其論及《偽古文尚書》時，並不直指《偽古文尚書》乃偽書一事，亦可獲得證明。亦即，從成海應《研經齋全集》所收諸文看來，即便當時成海應業已知曉閻若璩、惠棟等人所辯證的傳世《古文尚書》為偽書，但因性理學人心道心之論的依據乃在〈大禹謨〉，故其終究無法斷然指出《古文

尚書》之偽，只能委婉地註記道：「杜不見《古文尚書》」或是「杜云逸書」。由此可見，即使時入朝鮮後期，鮮儒重新注解詮釋儒家經典時，仍不免受到朱子學的限制，未必可以直接就經言經。

邱惠芬〈毛奇齡《詩經》學域外傳播研究反思——以朝鮮正祖《詩經講義》為例〉一文，以朝鮮正祖於五年、七年、八年、十三年、十四年，前後五次與四十九位抄啟文臣之間，長達十七年就《詩經》所進行的條問對答內容——《詩經講義》為研究對象，聚焦於其中對毛奇齡《詩經》研究的受容情況，其中特別關注正祖朝朝鮮儒臣是如何透過對毛奇齡說《詩》思想，以及其《詩經》研究方法之援引、批判，而來論辨、反思或修正朱熹之《詩》說，並藉此以觀察朝鮮《詩經》研究的特質。邱惠芬所採此一研究視角，彌補了歷來中國《詩經》學史研究在評論毛奇齡之《詩經》研究時，多只關注毛奇齡批朱是否正確無誤，或是毛奇齡考辨證據之廣博；本文相較可以深入毛奇齡之解經思惟、解經法，又可以考察毛奇齡《詩經》研究在朝鮮的傳播實相，同時也可描繪出正祖朝《詩經》學的面貌。故無論是從中國《詩經》學史之研究，或是毛奇齡之《詩經》研究，乃至東亞《詩經》學之研究，本文之研究切入視角，可以有效串聯此三個層面的《詩經》研究，具有一定程度之創意，在具體細微的考證之上，又能將研究議題置於宏觀的《詩經》學史，以及儒家經典於東亞的傳釋發展情況中來加以定位，足供學界參考借鏡。

邱惠芬此文除了確實掌握《詩經講義》之原典文獻，並將之置於十八世紀末的中、朝學術交流語境，以及朝鮮國內之學術現實環境來進行思考，因此能將正祖與抄啟文臣不斷商議完成的《詩經講義》，置於其所屬的內外學術發展脈絡中來進行考察，故能闡明《詩經講義》之解《詩》立場乃在：推詩外之意、釐清古今聚訟、明辨「興」義以「味」詩、說《詩》以朱子為依歸、藉句法文例以求詩旨等五點。本文作者不僅能明舉正祖《詩經講義》之特色，亦可使讀者一目瞭然地理解到明末清初之毛奇齡《詩經》研究，其所以受到朝鮮正祖與朝鮮儒臣的關注，基本上就是在朝鮮此種既求思明，同時卻又試圖吸取清朝新學的企圖下，由尊朱而朝實學發展，故其解經立場鮮明，而嬗變軌跡可循。誠如邱惠芬所指出的，毛奇齡《詩經》

研究對正祖朝《詩經》研究的影響，基本上可從形式體例與《詩》觀內容兩點來作觀察，而正祖與文臣之間的「御製條問」論《詩》形式，其實多仿照毛奇齡諸多《詩經》相關體例。而內容方面則在前朝《詩經》研究的基礎上，試圖透過毛奇齡的清朝考證新《詩經》研究法，就毛奇齡《詩經》學所探討之問題，進一步辯證朱熹《詩經》之對錯，而其解經目的則在「一統經義」。

金培懿〈融通一貫之經學／敬學——鮮儒崔象龍《論語辨疑》研究〉一文，主要藉由研究崔象龍《論語辨疑》一書，以考察崔象龍抱持著何種《論語》觀？《論語辨疑》之解經立場與解經法有何關聯？又崔象龍之《論語》認識使其聚焦於何種核心義理思想而來解經？並將之置於十八世紀中葉以還，嶺南退溪學派邁入經注研究興盛期的四書注釋發展脈絡中，試圖描繪出嶺南退溪學內部經典詮解、注釋的歷時發展脈絡與樣相。本文梳理出崔象龍《論語辨疑》承繼、接續、融通和貫串了嶺南退溪學內部諸宗派之為學立場，同時亦涵容了百數十年前近畿南人之經書觀、《論語》觀。

本文以崔象龍《論語辨疑》為研究探討核心，縝密追溯、爬梳嶺南退溪學派注經學的學脈傳承、發展與可能的轉向，並在此基礎上定位《論語辨疑》一書，既是「融通一貫」（「仁」統意旨，「敬」貫工夫）前賢解經的經解作品，同時又具有改良前賢解經成果，而且帶有解經轉向的特色。作者指出崔象龍解經之特色，乃試圖融通退溪與栗谷之性理說，又敢於修正其師鄭宗魯異於朱注的說法，進而終能批程子，並且直指朱注之「可疑」、「太淺」，乃至敢於斷定朱注某些詮解是為「錯解」！由此一窺崔象龍此種經典詮解轉向，其實帶有繼承兼批判的融通一貫之詮釋特色。據本文研究，崔象龍此種融通一貫之經學／敬學，乃是融通退溪門下鶴峰金誠一與寒岡鄭述二脈，同時旁涉西崖柳成龍一脈，亦即上承李象靖，兼採愚伏鄭經世、權槩之為學法，同時揉合眉叟許穆所辯證改訂後之退溪學，進而互參畿湖學派李栗谷、金沙溪與韓元震之學說的總合表現，堪稱是承繼受容十八世紀以降，嶺南退溪學派四書學研究之一貫脈絡的經學研究成果。

上述四篇專號論文，皆立足於詳實檢閱鮮儒之經解文獻，不僅分別具體指出朝鮮後期儒者注經之方法與特色，並能深入剖析鮮儒經解的時代性、地域性義理詮釋，以凸顯儒家經典在朝鮮後期的域外傳釋面貌，而且梳理出鮮儒解經與元、明、清儒者經解之間的關聯，既觀察出朝鮮後期儒者詮解儒家經典的知識依據來源，同時也描繪出該時期朝鮮經學研究的發展走向。又此四篇專號論文，皆參考了截至目前為止韓國當代學界的相關研究論文，在多方參證韓國學界前人之先行研究的基礎上，進而釐清朝鮮後期《易經》、《詩經》、《左傳》、《論語》等單經學史之學術發展脈絡與解經脈絡，在為此等朝鮮後期的經注作品作出定位的同時，亦闡明儒家經典於朝鮮後期的傳釋特色。

如上所述，本期專號最主要的學術貢獻，就在提供讀者深入理解儒家經典於朝鮮後期傳釋過程中，究竟凸顯出何種歷史性與地域性的解經特點，對日後有志一同研究朝鮮經注之同道，應可收投石問路之效。

金培懿

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教授